

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影响

——自尊心的中介作用

文 / 余俊文¹ 徐淑慧^{2*}

(教育学院, 温州大学, 温州)

摘要: 个体处理问题时采用的不同方式会对个体的生活造成不同的影响。导致应对方式差异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家庭因素和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大学生发放问卷, 探究其家庭教养方式、自尊心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家庭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应对方式有显著预测作用, 自尊在消极教养方式与应对方式之间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本文从教育角度提出建议, 帮助学生更加积极地面对问题。

关键词: 家庭教养方式; 应对方式; 自尊水平

一、前言

大学生近年来违法犯罪事件不断增加, 同时主体范围也在不多扩大, 共犯也在增加^[1]。他们在面对问题时的冲动行为、消极做法可能会给其造成严重后果, 因此引导大学生运用正确的方式应对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教养方式是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大致分为四种: 专制严厉型、放纵溺爱型、忽视冷漠型和民主权威型。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 父母对个体的态度和教育方式涉及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个体健全人格的形成以及心理健康等有着很大的影响。有研究表明, 不良的教养会导致孩子形成不健康心理, 如: 学习压力过大产生厌学的情绪和行为、无法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处理问题没有主见^[2]。

父母的不良教养方式会直接造成个体不良行为的发生。程刚和刘广曾^[3]关于高一新生问题行为的研究中发现, 青少年正处于三观建立的阶段, 父母专制拒绝这种教养方式会对青少年对自己生存的环境的感知造成影响, 对于公平意义的认知上出现偏差, 会让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处处都是失衡的现象, 降低青少年公平信念的水平, 增加问题行为的出现概率。儿童在内心深处渴望得到父母的关心和爱护, 而忽视冷漠型父母对

¹ 余俊文, 河南信阳人, 温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预防青少年犯罪

² 徐淑慧, 通讯作者, 陕西西安人,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预防青少年犯罪

* 基金项目: 2022 年度省社科联研究课题: “浙江省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发展特点、影响因素及培育策略探究” (项目编号: 2022N75)

儿童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存在情感或身体、教育上的忽视。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是否有轻生的想法与父母在教养过程中是否忽视孩子有着很高的相关^[4],父母不管不问的态度会降低青少年的自尊心^[5],让青少年内心消极,产生自我怀疑,对其心理健康产生不好的影响。

良好的教养方式会给个体带来正面的影响,例如在与人交往和适应社会方面就有积极的影响。吴素景等人研究表明,在父母情感、温暖与理解的教养方式下,有助于个体乐群性的提高,形成不拘小节、开朗的性格^[6];而父母的否认拒绝会使个体性格孤僻,羞涩,不能很好地融入团体。某研究发现,良好的教养方式会提升大学生的社交自尊水平^[7],程萧和薛朝霞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对孩子给予的温暖爱护可以提升孩子的自信水平^[8],让孩子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不拘束,更好地和他人交往、更好地适应社会。父母的教养方式影响着学生的学业状况,良好的教养方式会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学习,根据宋欢等人的研究,在面对学习中的困难时,孩子往往会产生不良情绪,而父母的态度影响到孩子的情绪状态,进而影响孩子采用的解决办法^[9]。父母利用积极的教养方式对待孩子,给予孩子温暖、理解,可以帮助孩子调节情绪和解决问题,增长其心理弹性,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减少由于情绪对学习造成的不良影响。

父母的教养方式也会影响个体的社会责任感、主观幸福感、安全感等,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在不良的教养方式,例如专制严厉的教养方式下,个体自我效能感降低,在面对别人需要帮助的情景时可能会由于低估自己的能力而漠视他人的求助,阻碍社会责任感的形成^[10]。个体感受到的家庭教养方式影响着个体从小到大所体验到的幸福感。段颖娜和姚新华发现,由于小学生还处于释放天性、爱玩的阶段,他们在忽视和民主的教养方式下对生活会更加满意,且在民主的状态下,小学生还会受到父母的关心和支持,引导其形成健康完整的人格^[11],故在该教养方式下小学生获得的幸福感最多;过去的研究表明,家庭教养方式可以影响

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12],当初中生在家庭中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温暖和正确引导时,在学校中与教师 and 同学们交往也就更加积极、随和,会体验到愉快的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主观幸福感也就越高,反之,在不良的教养方式下,个体无法体验到充实满足的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主观幸福感就会下降。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在积极的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更能和周围的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其适应环境的能力也就越强,这也说明了初中生能够在学校里有高质量的同伴关系^[13]。

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在童年时期所经历的教养方式对其成年的主观幸福感也影响巨大,有研究表明,在父母专制控制下成长的个体自信、自尊、乐观程度、积极性等会受到一定的影响^[14],他们面对生活的压迫很难保持平常心,所以幸福感较低;而在良好的教养方式下成长的个体,在成年后具有很好的应对问题的能力,会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良好的教养方式对个体产生积极的影响,会让其心理发展更加健康。童年时期对于健康的人格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张建人等人发现在童年期遭受虐待的个体,无法得到充足的安全感,形成不安全依恋,这可能会使其心理出现问题,诱发其形成反社会人格等人格障碍,无法形成健全的人格,在面对冲突和矛盾时给社会 and 他人造成一定的威胁^[15]。

在原生家庭中,家庭气氛、家长的婚姻状况、性格特点以及态度和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都有一定的影响^[16]。有研究者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教养方式之间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发现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很显著的关系^[17],良好的教养方式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朝着积极良好的方向发展,其中由于中国传统家庭中男性地位高于女性,相对于女性更有话语权和威慑力,孩子更加渴望父亲的关注与支持,所以父亲的积极关心等良好的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心理积极发展的影响更大,而在大部分家庭中,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交往要比父亲多,在孩子的生活参与度更高,所以孩子对母亲的依赖更高,因而母亲不良的教养方式对其不良心理的发展影响更大。同样,李影发现,在家庭中家长对孩子的

教育及其所营造出来的气氛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很大^[18]，如父母以民主的方式养育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就会让家庭更加和谐，让孩子有良好的成长环境，这是孩子心理朝着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家庭教养方式会给个体带来很大的影响，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能力、社交能力、自我调节能力等，综上所述，家庭教养方式会影响个体在应对问题时的态度，如学习困难时是增加学习投入还是自暴自弃、在团体中是选择积极融入还是默默不闻等。同时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对个体的心理有着不同的影响，如采用回避问题等消极的应对方式会降低个体的自我效能，使其心理弹性水平降低，难以承受失败，变得更加脆弱，其心理健康也会受到一定影响^[19]。

影响个体解决问题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的因素有很多，归根结底都有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子在其中。有研究表明，父母之间的关系会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进而影响个人应对问题的方式^[20]。不好的关系如父母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其营造的家庭氛围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养方式会直接影响孩子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而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会缺乏安全感，在面对问题时会产生很大的消极情绪。不良情绪的宣泄有利于个体身心健康发展，因为父母之间不和的关系会让孩子不信赖父母的想法，所以在宣泄情绪或是处理问题都比较独立，依照自己的想法处理，这也可能导致解决问题的方式比较极端，如采取暴力的手段等。

成年人的应对方式是在从小到大，从儿童时期到成年时期不断积累、汲取经验、自我调整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儿童时期，具有不同特质的儿童面对问题时采取不同的方式，尤其是在面对压力事件时不同特质的孩子处理问题的态度具有显著不同^[21]。有研究表明儿童的特质及儿童当下所处的环境都会对儿童应对方式造成影响^[22]，儿童应对问题的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积极的方式处理问题需要消耗一定的心理资源，一般与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有很大关系。贾双黛和张洛奕针对高中生进行了研究发现由于过于干预青少年的生活和决定或没有及

时给予温暖等父母不好的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的暴力行为显著相关^[23]。大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相对比较成熟，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在面对问题时习惯性的用最常用的方式解决，这种方式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不能捕捉来自父母、朋友等外界的关心和鼓励，大学生会找不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很难对生命产生敬重，不能体味到生命的价值。这类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有极大的可能采用消极的方式来应对问题。同样刘艳对高职大学生幸福感的研究也证明了，主观幸福感高的大学生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所用的办法更偏向积极的方式^[24]。

二、问题提出

（一）以往研究的不足

在过往研究中主观幸福感、安全感、父母的关心支持以及个体特质形成等都会影响个体在面对问题时采取的应对方式，而这些影响因素都与家庭教养方式有关，例如朱亚琪对问题少年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在良好教养方式下成长的个体的自尊水平更高，采用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越大^[25]。在目前的研究中，教养方式和应对方式的研究还是很少的，尤其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研究。所以本文基于以往的研究，以大学生为主体，探究大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对其积极应对方式的具体影响及作用机制，同时探究大学生自尊水平在其家庭教养方式和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作用。

（二）本研究假设

假设一：教养方式各维度与大学生应对方式有相关关系；

假设二：积极的家教方式对大学生应对方式有正向预测作用；

假设三：自尊对大学生应对方式有正向预测作用；

假设四：自尊水平在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应对方式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三）研究的意义

目前已经有研究证明了家庭教养方式对应对

方式有一定的影响,但很少人探讨这之间是如何影响的,是否有其他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本研究重点探讨了积极与消极的教养方式对积极应对方式具有怎样的影响,重点探究了自尊心水平在其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研究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大学生活是一个过渡期,大学生需要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本研究以大学生为主体,探究大学生影响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的要素,有助于外界采用更好、更合适的方法来培育孩子。

三、研究过程

(一)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河南某高校随机发放问卷共 326 份,被试是学校中大一至大四的学生,最后回收问卷共 310 份,回收率为 95.09%,通过剔除无效数据,最终有效问卷有 271 份,有效率为 87.41%,其中男生 143 人,女生 128 人。

2. 研究工具

(1) 教养方式量表

采用蒋奖等人编制的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共 42 个项目,分别分成 21 题的父亲版与 21 题的母亲版,该量表采用的是四级评分的方法,“4”为非常符合,“1”为非常不符合,17 题是反向计分, $\alpha > 0.70$,该量表具有可信度。

(2) 自尊量表

采用 Rosenberg 的 self-esteem scale (SES) 自尊量表,共 10 个项目。按照四级评分法,“4”为非常符合,“1”为非常不符合,第 3、5、

9、10 题是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自尊水平越高, $\alpha > 0.70$,该量表具有可信度。

(3) 应对方式量表

采用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共 20 个项目,按照四级评分法,“4”为经常采取,“1”为从不采取,具有两个维度,分别是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alpha > 0.70$,该量表具有可信度。

3. 统计方法

本研究调查数据均使用 SPSS 17.0 进行分析。具体统计方法主要包括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同时利用 Process 插件在 SPSS 17.0 中进行中介模型检验。

(二) 数据分析

1. 三者之间相关分析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利用 SPSS 26.0 将应对方式、家庭教养方式、自尊水平进行相关分析。如表 1 显示,积极应对方式与积极教养方式的相关程度 $r=0.17, P<0.01$ 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教养方式相关程度为 $r=-0.27, P<0.001$,呈显著负相关;与自尊水平的相关程度为 $r=-0.35, P<0.001$ 呈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消极教养方式的相关程度为 $r=0.23, P<0.001$ 呈显著正向关;与自尊水平的相关程度为 $r=0.26, P<0.001$ 呈显著正向关;与积极教养方式相关程度 $r=0.10, P>0.05$,二者不显著。自尊水平与积极教养方式的相关程度为 $r=-0.26, P<0.001$ 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教养方式的相关程度为 $r=0.35, P<0.001$ 呈显著正相关。由此可发现,随着家庭教养方式越积极,大学生自尊水平越低,应对方式越积极。

表 1 应对方式、教养方式、自尊水平的相关关系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n=271$)

变量	M \pm SD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自尊	积极教养方式	消极教养方式
积极应对	31.14 \pm 4.48	1				
消极应对	18.35 \pm 3.37		1			
自尊	22.10 \pm 3.95	-0.35***	0.26***	1		
积极教养方式	5.60 \pm 1.01	0.17**	0.10	-0.26***	1	
消极教养方式	3.82 \pm 1.16	-0.27***	0.23***	0.35***		1

注: *** $P<0.001$, ** $P<0.01$, * $P<0.05$;下同

2. 变量的中介模型分析

将变量标准化后,利用 SPSS 17.0 中 Process 插件进行 Bootstrap 中介检验,由于积极教养方式与消极应对相关不显著,所以不进行回归分析和中介检验。

(1) 中介效应分析

由表 2 可知,自尊与积极教养的之间的回归系数 $\beta=-0.99$, 显著性 $t=4.34$, $P<0.001$, 二者之间回归显著,且积极教养方式可以负向预测自尊水平;积极应对方式与积极教养方式的回归系数 $\beta=0.73$, 显著性 $t=0.27$, $P<0.01$, 二者之间回归显著,且积极教养方式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当自尊水平作为中介,与积极教养方式一起作用于大学生积极应对时,积极教养方式与积极应对之间回归系数是 $\beta=0.39$, 显著性 $t=1.46$, $P<0.05$, 自尊水平与积极应对之间回归系数 $\beta=-0.35$, 显著性 $t=-5.12$, $P<0.001$, 自尊水平在积极教养方式和积极应对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由表 3 可知,自尊与消极教养的之间的回归系数 $\beta=1.18$, 显著性 $t=6.02$, $P<0.001$, 二者之间

回归显著,且消极教养方式可以正向预测自尊水平;积极应对方式与消极教养方式的回归系数 $\beta=-1.05$, 显著性 $t=-4.67$, $P<0.001$, 二者之间回归显著,且消极教养方式可以负向预测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当自尊水平作为中介,与消极教养方式一起作用于大学生积极应对时,消极教养方式与积极应对之间回归系数是 $\beta=-0.71$, 显著性 $t=-3.02$, $P<0.01$, 自尊水平与积极应对之间回归系数 $\beta=-0.30$, 显著性 $t=-4.47$, $P<0.001$, 可以负向预测积极应对方式。自尊水平在消极教养方式与积极应对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由表 3 可知,自尊与消极教养的之间的回归系数 $\beta=1.18$, 显著性 $t=6.02$, $P<0.001$, 二者之间回归显著,且消极教养方式可以正向预测自尊水平;积极应对方式与消极教养方式的回归系数 $\beta=-1.05$, 显著性 $t=-4.67$, $P<0.001$, 二者之间回归显著,且消极教养方式可以负向预测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当自尊水平作为中介,与消极教养方式一起作用于大学生积极应对时,消极教养方式与积极应对之间回归系数是 $\beta=-0.71$, 显著性 $t=-$

表 2 自尊在积极应对和积极教养方式间的中介效应

	自尊		积极应对		积极应对	
	β	t	β	t	β	t
积极教养方式	-0.99	4.34***	0.73	0.27**	0.39	1.46*
自尊水平					-0.35	-5.12***
R^2	0.07		0.27		0.11	
F	18.82		7.54		17.25	

表 3 自尊在积极应对和消极教养方式间的中介效应

	自尊		积极应对		积极应对	
	β	t	β	t	β	t
消极教养方式	1.18	6.02***	-1.05	-4.67***	-0.71	-3.02**
自尊水平					-0.30	-4.47***
R^2	0.12		0.75		0.14	
F	36.29		21.82		21.16	

3.02, $P < 0.01$, 自尊水平与积极应对之间回归系数 $\beta = -0.30$, 显著性 $t = -4.47$, $P < 0.001$, 可以负向预测积极应对方式。自尊水平在消极教养方式与积极应对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由表 4 可知, 消极应对方式与消极教养方式的回归系数 $\beta = 0.67$, 显著性 $t = 3.40$, $P < 0.001$, 二者之间回归显著, 且消极教养方式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消极应对方式; 当自尊水平作为中介, 与消极教养方式一起作用于大学生消极应对时, 消极教养方式与积极应对之间回归系数 $\beta = 0.47$, 显著性 $t = 2.62$, $P < 0.01$, 自尊水平与积极应对之间回归系数 $\beta = 0.17$, 显著性 $t = 3.20$, $P < 0.01$, 可以正向预测积极应对方式。自尊水平在消极教养方式与积极应对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2) 中介效应检验

利用插件 Process 分别检验自尊水平在积极

教养方式与积极应对、消极教养方式与消极应对、积极教养方式与消极应对之中的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表 5 为积极教养方式对积极应对的影响关系的间接效应的分析检验结果, 路径为积极教养-自尊-积极应对, 总效应的置信区间为 $[-0.69, 0.88]$, 区间包括 0, 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是 $[-0.06, 0.88]$, 区间包括 0, 间接效应的区间为 $[0.18, 0.55]$, 即在该路径内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表 6 为消极教养方式对积极应对的影响关系的间接效应的分析检验结果, 路径为消极教养→自尊→积极应对, 总效应的置信区间为 $[-1.13, -0.31]$, 区间不包括 0, 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是 $[-1.14, -0.29]$, 区间不包括 0, 间接效应的区间为 $[-0.56, -0.18]$, 区间不包括 0, 即在该路径内自尊水平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模型如图 1。

表 4 自尊在消极应对和消极教养方式间的中介效应

	自尊		消极应对		消极应对	
	β	t	β	t	β	t
消极教养方式	1.18	6.02***	0.67	3.40***	0.47	2.62**
自尊水平					0.17	3.20**
R^2	0.12		0.53		0.88	
F	36.29		15.17		12.96	

表 5 自尊在积极教养和积极应对之间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上限	Boot CI 下限
间接效应	0.34	0.10	0.18	0.55
直接效应	0.39	0.24	-0.06	0.88
总效应	0.73	0.24	-0.69	0.88

表 6 自尊在消极教养和积极应对之间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上限	Boot CI 下限	相对中介效应
间接效应	-0.35	0.09	-0.56	-0.18	33.0%
直接效应	-0.71	0.21	-1.14	-0.29	66.98%
总效应	-1.06	0.21	-1.13	-0.31	

表7 自尊在消极教养和消极应对之间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上限	Boot CI 下限	效应占比
间接效应	0.20	0.07	0.06	0.34	29.85%
直接效应	0.47	0.17	0.13	0.81	70.14%
总效应	0.67	0.17	0.13	0.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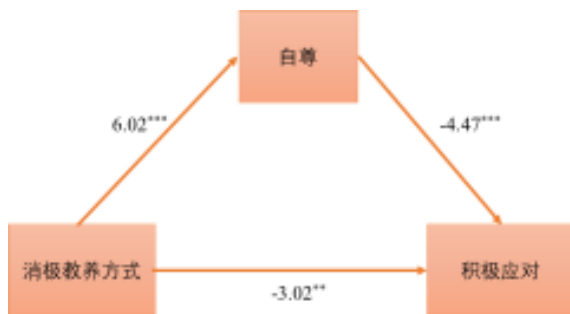


图1 消极教养方式、积极应对、自尊的中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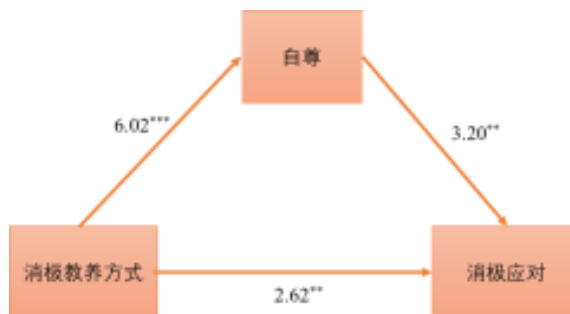


图2 消极教养方式、消极应对、自尊的中介模型

表7为消极教养方式对消极应对的影响关系的间接效应的分析检验结果，路径为消极教养→自尊→消极应对，总效应的置信区间为 $[0.13, 0.82]$ ，区间不包括0，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是 $[0.13, 0.81]$ ，区间不包括0，间接效应的区间为 $[0.06, 0.34]$ ，区间不包括0，即在该路径内自尊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模型如图2。

四、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积极教养方式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这与假设一致。在家庭中，良好的教养方式会培养个体良好的品质，让个体感受更多温暖和支持，主观幸福感也会比较高。这与凌宇等人的研究一致^[26]，主观幸福感高的个体在面对问题时更容易用积极乐观的态度。同时本研究表明，消极的教养方式与积极的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消极的应对方式呈正相关。在不良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大学生在面对问题时，会缺乏对父母的信任，绝大部分大学生还处于自我同一性建立的时期，他们内心敏感，遇到问题时常常会有自暴自弃的想法，甚至认为自己是多余、是拖累，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总想着逃避，甚至出现极端的行为。

本研究表明，积极的教养方式与消极的应对方式相关程度较低；自尊水平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这与前人的研究和假设不符^[27]。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个体成长过程中会接受很多来自外界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大学生的自尊心水平都普遍偏高，甚至很多大学生自尊心极强。在积极的教养方式下成长的个体，可能受到外界的某些如同伴群体等因素的影响，解决问题时采用不良的方式。并且自尊心过高的个体在面临某些问题，尤其面对自己的地位、利益、面子受损等的问题时，会处于维护自己的自尊心而采取相应的应对方式。

本研究表明自尊心在消极教养方式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消极教养方式与消极应对方式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在自尊的中介作用下，在消极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大学生会以相较更好的心态面对问题。在大学生活中，大部分的大学生都是离开家庭，独自在学校中生活学习，独自解决遇到的问题。原生家庭的消极教养方式会影响到大学生解决问题的态度与方法，例如专制严厉型的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欲过强，想要把控子女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对孩子的要求很高，这类孩子会从小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

象,有着较高的自尊,渴望得到父母及他人的认可。他们在面对问题时,会采取在外界看来较为积极的方式。

本研究表明,自尊心在积极教养方式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与假设不符。这是因为,在大部分积极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大学生会形成一定的良好品质,他们解决问题时与自尊水平并无很大关系。父母的温暖情感和理解会让他们有很强的安全感,能捕捉更多的社会支持,他们也会更乐意与父母交流,询问父母和身边人的意见,遇到困难过更多时候直面困难,采取积极方式解决问题。

五、结论

积极教养方式可以正向预测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消极教养方式可以负向预测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正向预测大学生消极应对方式,自尊在消极教养方式与应对方式之间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这对学校引导大学生面对困难和挫折时采用正确积极的方法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为家庭教育孩子提供一定的方法。

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1)参与调查的大部分是河南高校在读大学生,其他地区的较少(2)由于大四学生参加实习,大部分参与调查是大一、大二、大三的同学,大四较少(3)本研究没有分别分析父母各自的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影响

展望未来:结合实验法研究影响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其他因素,比如幸福感等。对于大学生面对困难的应对方式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让其更好的面对生活,同时探究个体形成应对方式背后的原因,对提升个体生活品质和精神财富具有重要意义。

六、启示

大学生涯是一个由学校到社会的过渡期,个体在大学生活中就需要自己去面对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努力引导大学生采用积极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首先,在家庭方面,为了孩子以后能够积极地应对问题,父母应该用积极的方式教养孩子。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给予孩子陪伴和支持,让他们能感受到社会支持,从而更加自信,在面对问题时也更加冷静,采取更恰当的方式对待问题。父母宽容理解孩子,也会让孩子信任父母,从而在面对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时,更愿意寻求他人的帮助。同时,父母在与孩子交往过程中要注意孩子自尊心水平,多与孩子沟通交流。

其次,在学校中,教师要承担起责任。教师应该及时关注学生的心理与行为问题,起到教师的引导作用,引导学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同时,教师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应当注意教学方式,针对学生心理差异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学生,维护学生的自尊心,让学生的自尊保持在中等水平,有助于其生活适应和未来的发展。

第三,学校也应该建立和完善心理咨询室的相关设施,提升相关的师资力量。学校要充实师资力量,招收专业的心理健康老师为学生上心理健康辅导课,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问题。同时学校也应该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室,让学生有所求,心事有地倾诉,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第四,社会与学校应该联合一起开展家庭教育的讲座,邀请家长来讨论交流。家长也是第一次当家长,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家长,如何给孩子良好的教养,有时家长也是不太清楚。社会和学校联合开展家庭教育的讲座,教会家长如何与孩子相处,有利于亲子关系的同时,也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家庭氛围,促进孩子自尊心的发展,用积极的教养方式培育其良好品格,让他们能独当一面,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可以迎难而上。

参考文献

- [1] 袁平凡. 大学生犯罪行为原因及防范研究 [J]. 法制博览, 2020, (25):19-21.
- [2] 王一涵, 刘华锦. 专制型家庭教养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与缓解对策 [J]. 文科爱好者 (教育教学), 2020, 36(06), 244 - 246.
- [3] 程刚, 刘广增. 父母拒绝对高一新生问题行为的影响——公正世界信念的中介作用 [J]. 教育观察, 2020, 9(47):34-36+52.
- [4] 余思, 刘勤学. 父母忽视对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影响: 自尊和希望的中介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0, 36(03):350-358.
- [5] Hanne Klæboe Greger, Arne Kristian Myhre, Thomas Jozefiak, et al. Child maltreat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a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residential care [J].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2016, 14(1):74.
- [6] 吴素景, 魏广宁, 邹增丽, 梁宝桐, 董柏青. 大学生家庭教养方式与乐群性的相关研究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0, 4(31):7-9.
- [7] 张宇峰. 大学生社交自尊水平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J]. 智库时代, 2020(08):280-281+284.
- [8] 程萧, 薛朝霞.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现状及其与自信水平、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 [J]. 心理月刊, 2020, 15(17):86-87.
- [9] 宋欢, 黄雪梅, 彭文波, 任平.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对学习投入的影响——自尊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J].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20, 35(12):12-16.
- [10] 沈倩如, 李岩梅.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0, 28(05):1042-1046.
- [11] 段颖娜, 姚新华. 家庭教养方式差异对小学生幸福感的影响 [J]. 教育观察, 2020, 9(19):68-69.
- [12] 许晴, 张野. 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师生关系的中介作用 [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1(02):7-11.
- [13] 杨宇. 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适应的关系: 同伴关系的中介和感知校园氛围的调节.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1, (04):19-24.
- [14] 陈霞, 郑爱明. 成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儿童时期父母心理控制的关系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20, 28(09):1320-1323.
- [15] 张建人, 孟凡斐, 凌辉等. 童年期虐待、父母教养方式、不安全依恋与大学生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关系 [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1, 29(01):28-32.
- [16] 罗苏梅. 基于原生家庭视角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索 [J]. 课程教育研究, 2020(49):18-19.
- [17] 张妍, 任慧莹. 父母教养方式与大学生心理健康关系元分析 [J]. 中国学校卫生, 2012, 33(04):423-426.
- [18] 李影. 家庭气氛和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和学业成就影响研究 [J]. 农家参谋, 2020(21):186+220.
- [19] Carpenter Thomas P., Laney Tyler & Mezulis Amy. Religious coping, str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adolescents: A prospective study.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2012, 4(1):19 - 30.
- [20] 彭自芳, 傅纳, 张新杰. 父母冲突与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关系: 教养方式和情绪安全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0, 36(06):668-676.
- [21] Thompson S F, Zalewski M, Lengua L J. Appraisal and coping styles account for the effects of temperament on pre-adolescent adjustment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4, 66(2):122.
- [22] 苏志强, 马郑豫, 张大均, 马健云. 童年期儿童应对方式发展的成因: 特质论还是情境论?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21, 37(03):335-343.
- [23] 贾双黛, 张洛奕. 父母教养方式与高中生问题行为的关系 [J]. 心理月刊, 2020, 15(18):76-78.
- [24] 刘艳. 高职大学生社会性问题解决能力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J].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5, 7(09):141-143.
- [25] 朱亚琪. 教养方式、自尊对问题青少年应对方式的影响 [J]. 现代交际, 2020(20):179-181.
- [26] 凌宇, 朱翠英, 刘文俐. 大学生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 [J]. 中国公共卫生, 2009, 25(02):168-170.
- [27] 岑延远, 郑雪. 大学生成就需要、自尊水平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J]. 心理学探新, 2005(02):75-78.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Patterns on College Students' Coping Styl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YU Junwen¹ XU Shuhui^{2*}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 The different ways people approach problems will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his or her life.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in coping styles, among which family factors and self-awareness are essential. In this study, our team mainly used the survey to issue questionnaires to college stude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parenting patterns, self-esteem and coping styles and its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parenting patterns have a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coping styl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self-esteem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vels of negative parenting patterns and coping styl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education perspective to help students face problems more actively.

Keywords: parenting patterns; coping styles; self-esteem level